



历史反思丛书

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君主集权国家对人身支配
政治权力与阶级关系
权力与分配
政治支配形态下的工商业
政治权力与古代中国的城市
政治权力与文化
君权与社会普遍危机和周期性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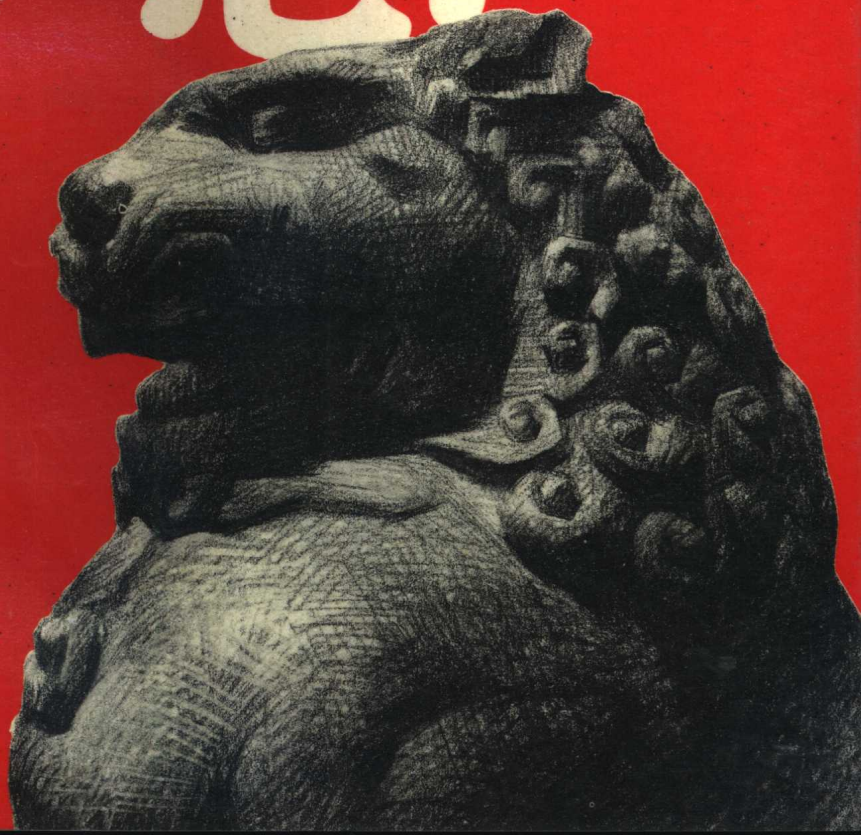
反

思

刘泽华 汪茂和 王兰仲 著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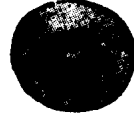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2 032 215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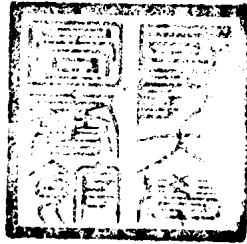
513684



历史反思丛书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刘泽华 汪茂和 王兰仲 著



Zhuanzhiquanli Yu Zhongguoshehui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刘泽华 汪茂和 王兰仲 著

责任编辑：宋一夫

封面设计：王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5插页 24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38年5月第1版 1938年5月第1次印刷

扬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厂印刷 印数：1—19000册

定价：3.00元

新华书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7-80523-011-8/K·10

编者 献词

025/12

1893年10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给他的俄国朋友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命运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们民族同样经历了许多灾难，可最能引起我们觉醒的、并导致民族思考的、将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灾难，是“十年浩劫”。

这场灾难，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

是必然，还是偶然，能够避免，还是无法避免，它占据着我们思维的时空，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我们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

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地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我们这样的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

是的。

可中国的路，怎样才能走好？

人们在求索；在沉思。

现实是严峻的。

人类在生存空间方面的竞争远远没有结束——更不会停止。对于先进的民族来说，它的空间会逐渐扩大，而对于落后的民族来讲，则是毫无疑义的相对缩小。

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新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现在世界势力的格局正朝着多极世界方向发展。每个国家能否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关键看在这场竞争中的

表现,可以说,这是一场人力、物力的角逐和国力的较量。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发展的大好时机。19世纪末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我们坐视日本跻身列强,自己却坠入苦难深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国家与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可我们却陷入“十年浩劫”的泥潭中自相格斗。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我国的地位,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不久以前,赵紫阳同志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可见,中国的这场改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这是一场十分艰巨和痛苦的革命。现实又在框定我们,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大国,不仅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而且,我们还必须从现在起,尽快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况,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其责任之大,负荷之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场改革能否成功,它的基点是建立在怎样认识中国国情上。应当看到,以往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国情和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事关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致使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导致失误和偏差,最后酿成

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中国的国情，就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只有把中国的国情了解清楚，才能找出现今社会的弊端；才能决定从哪里改，改什么；只有知道这些流弊是怎样形成的，才能掘其根，断其流，改革才能彻底。

今天的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不同之处，改革是全民族的事情。改革的最终目的，使社会得以发展，可社会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经济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最终是人的改革。中国的振兴，也就是中国人的振兴。所以，怎样看待历史上的中国人，现今的中国人，中国人将会有个什么样的命运，是人们思考的又一个重点。

我们不主张妄自菲薄，同时也不提倡妄自尊大，既不能只看见我们曾有被屈辱和令人痛心的历史而把我们民族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历史上曾有远远领先于西方的汉唐时期而沾沾自喜。人贵有自知，一个民族也贵有自知，这是立于不败的前提。我们的先人总结出三种自知的方法：一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二是“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三是“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这三种办法既看清了人的外表，也看清了人的内在；既可知人的过去，也可知人的将来。这个总结是深刻的，它恰巧与本世纪英国著名学者柯林武德所提出的“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知”如出一辙，可见这是东西方人们在人生旅途中的共同领悟。

但是，必须看到从明中叶时，我们落后了，经济的落

后，政治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归根结蒂为人的落后。从孙中山先生起，政治形态上的革命接连不断，可是对我们头脑和心灵深处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意识却没有很好地加以彻底清算。事业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不但没能使其很好地发展，反而自己搞乱了方寸。“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负主要责任，可我们曾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卸责任吗？而且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全民族的灾难？其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民族中，有滋生和蔓延这种灾难的基因和土壤。我们不要怕看见自己的不足，人生暂短，岂能总带着不足度过人生。

漫长的历史岁月构筑了中国的独特风貌，也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有品格。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今天中国的历史背景，明天中国的发展走向；才能分辨出在我们民族身上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最终使每个人得到发展和社会得到前进；才能迎接世界新格局的挑战！

人们习惯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可走向现代化，首先是走出落后；走向世界，首先是走出中国；走向未来，首先是走出现在，这都关涉着一个起点的问题。

人们在前进，也就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或在已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是要走出去的。

这个断言，早在19世纪时一位欧洲人就已经下过。他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这头睡狮醒来，整个世界将在她的脚下发抖！

中国不称霸，但是，中华民族必须站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并且，还要有比现在更尊荣的地位！

为此，我们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反思丛书》。

她将向人们回答：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由先进变成了落后；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今天中国人的人格与历史上中国人的人格之间有何关系；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己起飞的基点；今天的中国应该从历史的中国继承什么、抛弃什么等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热烈地希望：通过中国海内外学者对我们民族历史的反思，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思，推动整个民族的反思，最终激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勇毅和决心。

作为一个事业，我们由衷地热爱它，但是，我们把所做的一切，仅仅看作是开始。时代给予了中国人这个使命，它要求大家——每个中国人都来做。谁不能相信，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经过反思后的中国和中国人，将不以一个新的面貌去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呢？

1987年10月于长春

引 子

在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阳翟大贾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以后吕不韦不做买卖了，他耗费千金帮助异人回秦继承了王位。商人一向唯利是图，吕不韦为何竟会如此慷慨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了他在从事此项“壮举”之前与其父的一段对话，这段十分精彩的对话说出了这其中的奥妙。吕不韦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原来如此！吕不韦花费巨资帮助异人回秦继位，并非什么侠义之行或仗义之举，而是非一般行商为贾之人所具有的心胸和胆识在他经商谋利中的实践。吕氏父子可谓算破“天机”，当异人回到秦国继位成君之后，吕不韦也便一步登天，当上了丞相，并受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蓝田12县、家僮万人，富贵可谓达人臣之极^①。为什么在当时投机政治反倒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快地发财致富呢？我们认为是由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通的定义，是指一个

^① 参见《史记·吕不韦列传》，《战国策·秦策五》。

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老爷还有什么事不归他管呢？他们“为民父母”，行政事务要管、经济财政要管、日常礼节要管、断案要管，其它诸如老百姓种什么庄稼、盖什么样的房子、梳什么发型、穿什么服饰等等都要由他来管，真可谓无所不管！只要他有了权，什么都得他说了算。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于人们的生理需求，但在君主集权制条件下，却可以支配人们生理需求的物质资料。在这里，权力实际可以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勾来。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吕氏父子以其商人所特有的敏锐目光，发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即政治权力在当时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宝。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上君主，便可以把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以至生杀各种大权集于一身，便可以“以天下恭养”^①，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②。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与动荡安定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与作用。

①《战国策·秦策四》。

②《管子·任法》。

目 录

引 子.....	1
一、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1
(一) 君主独裁政体的形成.....	1
(二)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结构特点.....	11
(三)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基础.....	20
二、君主集权国家对人身的支配.....	25
(一) 被征服的人.....	26
(二) 被控制起来的人.....	32
(三) 等级中的人.....	56
三、君主集权国家对土地的支配.....	66
(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66
(二) 权力支配下的个人土地占有.....	73
(三) 政治权力与土地转移.....	83

四、政治权力与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 ·····	96
(一) 权力支配形态下古代中国社会的分层·····	96
(二) 政治权力在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中的作用·····	103
(三) 专制皇权与封建社会中的小农·····	114
五、权力与分配 ·····	121
(一) “权”与“利”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121
(二) 国家对社会产品的攫取·····	127
(三) 贪污——古代社会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136
六、政治支配形态下的工商业 ·····	149
(一) 官府手工业·····	149
(二) 官营商业·····	168
(三) 民营工商业·····	181
七、政治权力与古代中国的城市 ·····	193
(一) 军事，政治与早期城市的起源·····	193
(二) 政治性的城市——4000年不变的格局·····	200
(三) 政治性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及影响·····	211
八、政治权力与文化 ·····	224
(一) 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	224
(二) “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的出路·····	233
(三) 传统文化内涵中的专制主义·····	243

九、君权与社会普遍危机和周期性动荡 ·····	258
(一) 皇权与社会灾难·····	259
(二) 国家机器恶性膨胀与财政危机·····	272
(三) 苛政在社会经济全面崩溃中的作用·····	282
(四) 周期性的社会动荡·····	291
十、关于几个问题的思考 ·····	298
(一) 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向背关系·····	298
(二) 君主专制下人的臣仆化与社会的僵化·····	301
(三) 民众的贫穷愚昧与君主专制的互补·····	304
(四) 没有制约机构与强谏多悲剧·····	306
(五) 君主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	311

一、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一) 君主独裁政体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战国群雄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古代这种权力至上的专制制度就是于此时趋向定型的。高度专制、残暴的秦王朝在历史上仅存了10余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继起的汉王朝在政体上仍继承了秦的制度，以后历朝历代无不沿袭，遂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

这样一种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同其它事物一样，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事实上，秦汉时确立的这种中央集权形式的君主专制已是一种很完善的制度了，在此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我们认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实是中国上古以来政治制度、政体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向。

君主专制现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严格说，它并不自秦汉始。早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商周时代，君主便拥有极高的权威了。《书经》中保存了不少那个时代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可以看到这些君主大多是一副专断独裁的面孔。全国的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王的旨意。商代盘庚迁殷的故事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史载商王盘庚计划迁都于殷，但

许多贵族、平民留恋故土，不愿迁徙。在这种情况下，盘庚便对他的臣民们发出了严厉的威胁：违王命者不仅自身要受诛，连子孙也得遭殃^①！象这类一人专断的恫吓，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它反映了君主在当时国家中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表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显然与民主政治或贵族共和相去甚远。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一条君主专制的道路。而所以会走上这一道路，我们认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起点

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机构，曾长期存在于我国的阶级社会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古代中国，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以前的原始氏族组织、机构却仍未瓦解，它只是在功能上适应了新的需要，开始以原氏族的机构履行国家职能，即原氏族的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器。例如商代，当商人进入阶级社会后，其统治部族内部尚保留着氏族组织。据今人研究：在商王国内，社会组织内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血缘纽带并没有切断，当时支撑商王朝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诸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商王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商族共同体内的亲族组织是相统一的^②。

周人的情况则更为典型。周王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形式是所谓宗法分封制。在这一制度下，周王子自为大宗，分封出去的各诸侯则为小宗；诸侯分封之后，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册封其子

①《尚书·盘庚》载商王语：“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

②见朱凤翰：《论商人诸宗族与商王朝的关系》，《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版。

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之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这也就是师服所说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①，在这里，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来说，周王是君主；而作为族的统率者来说，周王则是宗主。每个在血缘关系中处于不同等差地位的家族，同时就是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环节。由此可见，血缘宗族关系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受到破坏，而是和政治关系系在一起，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到一起了。

有的学者看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氏族血缘关系的这种密切联系，因此断言：“在这氏族残余势力和贵族政治力量或强或弱还存在的日子，专制制度的统治和专制主义意识，……是不可能与之并立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中，氏族残余的血缘关系与专制主义并非水火不容，血缘宗法关系并未给古代的君臣关系带来任何民主；相反，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倒恰恰是源于这种血缘亲族关系。

我国阶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缘宗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字，《说文解字》曰：“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其字的本身就不仅限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而包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在里边。在这种父权宗族内，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②。在家中拥有“至尊”

^①《左传》桓公二年。

^②见《礼记·坊记》。